

亚洲大趋势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英] 乔·史塔威尔 / 著 蒋宗强 / 译

HOW ASIA WORKS

《经济学人》2013年最佳图书

畅销书《亚洲教父》作者最新力作
全面分析亚洲国家经济成败原因，预测未来发展道路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亚洲大趋势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英] 乔·斯塔威尔 / 著 蒋宗强 / 译

HOW ASIA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 (英) 史塔威尔著；蒋宗强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

书名原文：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ISBN 978-7-5086-4478-3

I. 亚… II. ①斯… ②蒋… III. 亚洲经济-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IV. F1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48244 号

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Copyright © Joe Studwell,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著 者：[英] 乔·史塔威尔

译 者：蒋宗强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42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3-513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478-3 / F · 3156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在激烈的时代环境中，怀着苦涩的心情，我离开了……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中洛锡安区竞选演说

我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起始年份是 1980 年），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起始年份为 1960 年），如果未做特殊说明，则出自其中一个数据库。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引用的数据没有逐一给出注释，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减少注释的数量。

世界银行改变了一些术语的说法，现在把“国民生产总值”(GNP)改称为“国民总收入”(GNI)。虽然一些读者可能习惯于原来的术语，但本书中还是采用了“国民总收入”这个说法。根据世界银行介绍，这两个术语在统计方法上没有差异，但读者应该注意到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前者指一个国家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既包括国民在境内获得的收入，也包括在境外获得的收入，而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只包括国民在国内经济中的收入。

虽然我努力控制注释的数量，但还是加了很多注，它们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对某一点进行解释，或表明我说的话有真实来源。我不期待，也不打算让读者们阅读所有注释。如果你觉得某一点特别重要或者存在争议，最好读一读相关的注释。我希望在另外一个独立的附录中，为那些感兴趣的读者发布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佐证我的观点，这项工作的进展将会以报告的形式发布在网站上，网址是 www.howasiaworks.com。

如果没有另做说明，本书涉及的汇率都是采用当时或当年的汇率。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为满足中国相关的出版规定，本书中译本的部分段落有所删改。但是，就本书而言，相关的删改并不多，也没有显著影响本书的主旨。



前言

本书论述了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指出了政府可以采取三个关键的干预措施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对这些措施运用得最为有效，结果均迅速地从一个贫穷状态过渡到了富裕状态，其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与这些成功的经济体相比，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虽然具有同样的发展愿景，而且拥有同样的或者更好的资源禀赋，却没有采取同样的发展政策，它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事实表明，这种成就是不可持续的。

第一个干预措施是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在贫穷国家中，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但提高农业产出却是最容易遭到忽视的。成功的东亚国家通过自身发展历程表明，要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一条必由之路就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农业，这类农业模式需要精耕细作，实际上就相当于规模较大的园艺业。在这种农业模式下，虽然人均收益微薄，但能够让一个贫穷经济体内部的可用劳动力找到用武之地，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效益和农业产出。结果就是出现了初步的生产过剩，刺激了人们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

第二个干预措施是引导投资和企业进入制造业。从很多方面来讲，也可以把这个措施称为第二个“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开始退出农业领域时，可用的生产技能及资源是有限的，发展制造业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那些技术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就在工厂里利用机器创造价值，这些机器在世界市场上是很容易买到的。此外，在东亚，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率先

根据制造企业的出口业绩给予一定的补贴，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政府补贴与我所说的“出口纪律”^①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的速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最后一点就是干预金融部门的运行，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让金融业服务于小规模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的发展，这是加快经济转变的第三个关键要素，也是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发展阶段肯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此时，在第三个阶段，国家的作用是确保金融业能够一如既往地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推动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学习先进技术，为未来获得高收益奠定基础，而不应该思考如何利用前期积累的财富去获得短期收益或扩大个人消费。这种发展战略可能让国家与很多商人以及消费者处于对立状态，因为这些人有可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在亚洲，曾经有一些国家虽然没有遵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策处方”，但也实现了快速增长，结果一度导致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问题上出现了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世界银行研究了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两个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道路，并分析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些突然实现较快增长的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极小的。由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两个离岸金融中心面积狭小，人口密集，不存在农业部门拖累整体生产率的问题，所以正常的国家和地区无法与这两个地方相比。但世界银行依然在198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中国香港、新加坡纳入了其案例研究范围，提出“金融振兴经济”的观点，引发了极大争议，导致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¹后来，到1993年，世界银行又提出了一份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该报告虽然承认工业政策以及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在某些国家的存在，但低估了这些政策的作用，而且对农业问题避而不谈，并把中国香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放在一

^① 作者所说的“出口纪律”指的是政府通过出口信贷、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商品倾销、货币贬值、央行再贴现等政策渠道，引导或逼迫本经济体内部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出口业绩，以期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不断实现产业技术升级。——译者注

起，共同界定为“表现卓越的亚洲经济体”，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则被置于次要地位（该报告未谈及中国大陆的经济）。²

在当时那个年代，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对那个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一致认为，风靡美、英两国的自由市场政策必定适用于所有经济体，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可以采用自由市场政策。³当时关于发展政策的争论中经常出现尖锐激烈的言辞，以至于损害了学术严谨性，世界银行的报告就能说明这一点。事实上，虽然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一些学术界专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不认同“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在论证自身观点时偶尔也会发表一些与“华盛顿共识”相似的言论，这种情况下，各国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只会更加困惑。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曾经研究了日本的发展历程，并于1982年出版了一部颇具新意的学术专著，即《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今天，日本的发展模式正在被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经济体所复制。”曾经从结构角度分析韩国经济的艾丽斯·阿姆斯特登（Alice Amsden）在一本专著的序言中也提到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泰国模式”之类的字眼，艾丽斯将这几个经济体放在一起研究了。即便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也在1991年新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的序言中提到，马来西亚和泰国正在遵循韩国及中国台湾的路子，方法日臻成熟，虽然这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早论述经济发展的著作之一，而且是最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著作之一，但也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放在了同一尺度下进行衡量。⁴由此可见，在关于东亚发展模式的争论中，专家们为了赢得争论而各抒己见，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只有在各经济体都维持快速增长之时，人们才会去研究经济发展的性质，才会产生分歧。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巴西以惨痛的现实说明了仅仅依据增长率评判经济发展是多么危险。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实现了快速增长，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可谓是一枝独秀。除了东亚国家之外，只有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维持在7%以上。⁵但到了1982年，由于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巴西经济轰然崩溃，陷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长年零增长的困局。事

实表明，巴西在早年的增长中，过度依赖债务的驱动，导致其经济并不是真正具有了生产力和竞争力。

在东亚，虽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7个经济体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不低于7%的增长速度，但从1997年开始，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反思阶段。此时，日本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但实现了充分发展之后，日本也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比如何脱贫致富更富有挑战性，而这似乎并没有引起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注意，它们仍然继续努力追赶那些成功经济体。这些国家或地区要么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要么很快就恢复元气，并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技术进步的道路，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却被彻底击倒，陷入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增长率低位徘徊的困局。目前，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000美元和5000美元，而且这两个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贫穷程度非常高，相比之下，韩国与中国台湾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2万美元左右。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所有这些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境地。⁶

亚洲金融危机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政府的政策干预对东亚经济体是实现长远成功还是归于失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政府在“二战”之后对农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调整，把现代化努力集中在制造业，并让其金融体系服务于这两个目标。因此，它们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结构，使其再也无法倒退到早期发展阶段水平。某些东南亚经济体虽然在长期内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没有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不过它们却听从了某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开放了金融部门。日本经济学家义原国雄（Yoshihara Kunio）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发出警告说，东南亚国家存在可能变成缺乏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不料这种警告果真变成了现实，当投资资金被耗尽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倒退到了原来的贫穷状态。简而言之，不同的政策选择造就了亚洲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⁷

现实的东亚：冰火两重天

亚洲经济体在谋求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主要是由其政府的发展战略决定的，这些战略既包括农业战略和制造业战略，也包括金融业战略。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亚洲奇迹”的大辩论开始之前，这些发展战略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本书探讨的就是这些战略。我先论述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开展的彻底的农业用地再分配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土地问题成了东亚最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承诺土地改革对中国、朝鲜和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农经济很快让位于农业集体化，结果导致农作物产量陷入了停止增长甚至减少的状态。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再分配改革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并且改革成果得到了延续，正是这一点才催生了长期的农业繁荣，促进了全面的经济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开始探讨如何进行更加公平的土地再分配改革，如何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和可负担的信贷服务。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确启动了很多改革方案，但这些方案落实之后，实际效果远远不如东北亚国家那么明显。东亚国家间的差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既导致总体性的发展步履维艰，又为其他政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甚至60年后的今天，土地问题仍然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马来西亚的土地问题也比较突出，只不过程度没有上述几个国家严重，因为马来西亚资源禀赋较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部门薄弱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为什么农业如此重要，其中的部分探讨方式就是考察日本和菲律宾的情况。

第二部分转而论述制造业的作用，研究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在扶持制造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地把“加强补贴和保护”与“促进竞争和出口”相结合。政府通过出口纪律，逼迫企业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进而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这样一来就能克服政府补贴和保护政策带来的传统问题，即企

业家只愿把政府补贴当作财政激励的资金装进自己的腰包，却不注重提高产品竞争力，而一旦有了出口纪律，政府就会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增长情况来决定是否为企业提供保护、补贴和信贷，企业就不能只躲在关税、技术等壁垒后面，只考虑如何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达不到政府制定的出口业绩评价标准，就无法继续享受政府的财政激励，就会被成功的企业兼并，有时甚至会直接破产倒闭。因此，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政府利用公共资金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也得到了回报。

上述这点就体现出了东南亚与东北亚及中国之间巨大的政策差异。在东南亚国家里，主流的企业家在能力方面绝不逊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但政府没有引导他们从事制造业，也没有对他们实行出口纪律。相反，这些国家只是建立了一些国有制造企业，而这些国企几乎没有遭遇多少同业竞争和出口压力。因此，政府各种政策性投资的收益率非常低。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期，政府虽然没有在本国培育出强大的制造企业，也没有大幅提高本国制造业的技术能力，但由于大批外国直接投资的到来，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住了。这些外来资金大部分都集中在先进制造业内部的加工业务。然而，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后，东南亚国家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产业差异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如果非要说东南亚国家有什么国际知名的产业品牌，那么我们充其量也只能说出类似于新加坡虎牌啤酒（Tiger Beer）以及泰国胜狮啤酒（Singha Beer）、大象啤酒（Chang Beer）之类的品牌，但这些酿酒企业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企业。由于自身没有成功的、大型的、知名的企业，东南亚国家在技术上就不得不依靠跨国企业，依靠在国际产业链中利润率较低的环节充当跨国企业的承包商而艰难地谋求生存。我们在第二部分将前往韩国与马来西亚，通过实地考察和拜访来深入分析这些国家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包括但不限于钢铁、汽车制造技术），进而分析这些国家能够主宰或不能主宰本国工业命运的背后因素。

在第三部分，我们分析了各国的金融政策。在成功的东亚国家中，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架构，优先考虑的事情往往都是如何才能发展好产量高、规模小的

集约型农业，如何才能促进国内制造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因此，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经济体中，金融体系会受到严密监管，在金融业达到高级发展阶段之前，政府会一直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让金融业服务于国家政策目标主要是借助银行信贷机制加以引导，具体讲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机制来逼迫制造企业提升出口业绩，企业要想获得信贷，必须向银行出示出口订单。此外，出口业绩也能帮助银行确定自己最终能否收回贷款，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企业的出口业绩较好，则其资信状况就会优于那些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制定了低于市场利率的储蓄利率，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对公众征收了一种隐性的税，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农业和工业的补贴能力，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非法的吸收存款机构，即所谓的“场外交易市场”。不过，虽然“场外交易市场”会从银行手中抢走一部分存款，却不足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东南亚国家的储蓄水平很高，这与东北亚国家比较相似，但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利用这些储蓄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过程中找错了方向，这些投资资金的流向主要包括规模大、效率低的种植园农业、非制造业务类企业以及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后来，东南亚国家又听从某些富裕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解除了对本国金融业的管制，开放了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比如股市），并取消了资本流动管制政策，结果导致本国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也曾经在早期发展阶段收到了同样的建议，不过它们都很明智地拒绝了，而且尽可能延长政府管制的时间。东南亚国家过早地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家族企业控制的银行纷纷涌现，但这类银行根本无助于扶持出口导向型的出口企业，而且过多地从事关联方借款，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被狭隘的私营部门把持了，而私营部门的目标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几乎完全不一致。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曾经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最近俄罗斯也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区。我决定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仔细研究一下为什么金融自由化在东南亚国家行不通。

本书的论述范围

为了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把问题讲清楚，我在本书中做了很多简化，但核心要义并未淡化。在考虑需要简化哪些内容时，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略去哪些东亚国家。因为这本书旨在论述那些最起码获得了些许成功的发展战略，所以，一些失败的东亚国家就略而不谈了。朝鲜、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⁸排行榜上较为靠后的国家也不在讨论范围。这些国家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格外引人瞩目的：它们的政治和经济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内向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它们重蹈了历史的覆辙，因为1978年前的中国、1989年前的苏联以及1991年前的印度都以惨痛的经历给人们上了沉重的一课：如果一个国家不与世界开展贸易和互动，则其断然不可能领先于世界发展潮流。

因为本书论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所以忽略了东亚两个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将它们两个描述成“口岸式离岸金融中心”，因为它们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国际航运中心。）文莱这个袖珍的石油富国以及澳门这个东亚传统的博彩中心，因为其发展战略具有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也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过去这么多年里，很多人拿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做对比，或者拿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做对比，进而争论什么才是正确的发展战略，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人口、地理、资源等方面差异十分显著，这就决定了其发展战略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关于这类争论，世界银行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我不想搅和进这类争论中。离岸金融中心在很多方面与正常的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在世界舞台上，它们凭借着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竞争，而且其结构性的成本远远低于正常的国家，因为在正常的国家中，人口规模较大，而且居住地点较为分散，农业部门也拖累了整体生产效率。⁹ 离岸金融中心的低成本也意味着它们享有内在的财务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它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严格来讲，它们是寄生性的，因为它们必须找到一个或多个主顾，依靠这个或这些主顾谋求生存。¹⁰

我在本书中讨论了中国台湾的情况。从政治角度来看，不能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却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台湾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统治了大约半个世纪。台湾人口总数约为2 300万，中国台湾与大陆的发展政策既存在诸多差异性，又表现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折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家和官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共同经历。本书深入分析了台湾经济史的这种两面性。

略去了几个失败的国家 and 离岸金融中心，再对中国台湾的情况做出一些调整之后，我们就剩下了9个主要的东亚经济体，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东北亚组，包括日本以及其两个前殖民地（韩国、中国台湾）；第二组是东南亚组，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第三组是社会主义组，包括中国（这里专指大陆）和越南。然而，为了进一步简化本书结构，越南也略去不谈了。请越南的读者朋友们原谅我这么做，但越南与中国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两者都是正在进行渐进式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某些相似相通的经济结构和框架，除此之外，很难看出二者还有其他的共同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更加引人注目，成就更加突出，所以，只能留下中国，略去越南不谈。

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关于中国的问题，关于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差异，主要放在第四部分进行探讨，但与中国发展历程有关的一些问题在前几章也有提及，因为这些方面只能与东亚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讲。第一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早期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以及后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1978年以后的农业发展历程在第四部分也有所体现。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前的工业政策在第二部分得到了集中论述，因为这一部分与台湾在国民党败退之后的发展历程具有直接联系。第四部分论述了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只在第四部分有所涉及。

发展的背景因素

在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本书只是直接分析了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这三个领域的政策，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或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口因素了。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年龄分布对其发展潜力具有巨大的影响。如同资金一样，劳动力也是一种经济投入，可以说是一种形式的“资本”。在人口总量中，除去尚未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人群和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群，剩下的就是达到劳动年龄的人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越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尤其是婴幼儿、儿童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更快，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迅速增加。这些人口变化趋势对东亚地区实现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人口红利”。但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当这个比率突破临界点之后，劳动人口的规模就会随之迅速缩小，退休的老年人口依靠积蓄维持生计，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变成了消耗者，从而减少了原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的数量。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作为一个刚刚成熟的工业国，面临着重重问题，这与人口因素的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具有密切联系。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状况，伴随着经济腾飞，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但到目前为止似乎已经增加到了最高水平，并开始呈现出减少趋势，人口红利也呈现出了弱化趋势，在今后10年，人口因素的变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

人口问题非常重要，而许多东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并没有特意针对人口问题采取过什么调控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学的一切变化都是顺其自然的。但中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努力把人口问题纳入经济政策范畴的国家。不过，这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时期，中国人口原本就在不断增长，他告诉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从而导致中国人口数量激增。后

来，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原本已经开始下降了，但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仍然努力控制人口出生率，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以限制新生儿的数量。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状况仍然取决于政府在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领域的政策选择，这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归根结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其有多少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而是怎么运用好这些人口。

另外一个能够影响发展的因素就是教育。本书认为教育只是发挥了一种背景性的作用，因为虽然教育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都会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开展教育的年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¹¹在统计教育情况时，我们搜集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比较注重小学阶段。小学阶段是人们培养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最关键的阶段，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经济腾飞时，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有 55% 的人都是文盲，1960 年降低到 45%。1950 年，韩国人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与其说是教育催生了经济发展，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促使家庭加强子女教育，从而使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具有了可能性。

20 世纪初，菲律宾还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美国的殖民政府就高度重视教育投资。即便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但菲律宾却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最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得远一些，就会发现古巴 15 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其入学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自从 1960 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在第 95 位。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非常大，但工作机会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有 25 000 名古巴医生被派到国外从事政府资助的工作的原因。¹²前苏联也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口的增加速度。

对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这种不协调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相关解释，其中最常听到的一种解释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错误的教育太多。在东亚，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模式存在鲜明的对比，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都相对比较重视职业培训，而那些曾经沦为欧美强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则不是那么重视建立职业培训系统。在初级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台湾学生可能比一个具有会计资质的马来西亚学生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台湾的高等教育中有 55% 都是职业培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而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所占比重还不到 10%。20 世纪 80 年代，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而言，中国台湾比美国高出了 70%。¹³ 韩国与日本的教育体系为整个东亚树立了典范。台湾的教育体系越来越类似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而反观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则更加重视人文学科以及“纯科学”，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但我们绝对无法以缺少职业培训和工程人员，去解释东南亚国家的落后。首先，在东北亚，大多数工程人员也都是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后才培训出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刚刚拉开帷幕之际，虽然工程人员奇缺，但仍旧成功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才着手加强职业培训和科技教育。¹⁴ 相比之下，虽然古巴、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正规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之所以没有出现协调关系，还有第二个原因（此原因比第一个原因还重要），即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关键的知识都不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到的，相反，是在企业中学到的。

这种“企业内学习”（intra-firm learning）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在发射卫星上很成功，却在发展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原因，即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里，而不是集中到企业里。东南亚国家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遵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大力发展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设立的研究机构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教育 and 科研方面的投资就比较务实和有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大企业。这一点与前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有利于这些国家迅速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以印度